

歷史、記憶與劇場

文／江婉琦

主題：歷史、記憶與劇場

日期：2021.09.25

主講：陳正熙（表演藝術評論台年度駐站評論人）

與談：廖俊凱（狂想劇場導演）

主持：曾瑞蘭（狂想劇場製作人）

「歷史形塑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記憶，透過了解才有對話的可能性，劇場不是下結論，而是了解的其中一種方式。」

狂想劇場 15 週年，今年因為疫情，一方面希望回顧過去的作品，一方面與同業聊聊做紀錄劇場的看見，思考下一步可以有什麼樣的可能性，而舉辦一系列「歷史、記憶與紀錄／劇場」線上論壇。第一場線上講座由狂想劇場製作人曾瑞蘭主持，表演藝術評論台年度駐站評論人陳正熙老師主講，會後由狂想劇場導演廖俊凱與談，聊聊關於這幾年紀錄劇場的心得。

我們怎麼看待歷史、記憶與劇場？陳正熙老師在開場與大家分享他近期回顧自己劇評的心得，他發現，他過去的評論寫作，跟文字被生產出來的時空環境有很大的關係。如果從現在回頭望，因為時空的變化，會讓他有新的論點、批評和學習。我們所提的觀點，都在現在這個時候發生，在這時發生，但卻是過去所有經驗累積而成。然而，這個觀點不會到此為止，因為我們要面對的是未來，今天，我們再往下走的時候，站的地點只是過程當中停下來的點。

歷史是為了回應未來，陳正熙老師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想想看，如果今天他談的對大家有一些價值，一方面可能回應了我們各自帶著的核心關懷，另一方面，我們可以想想，如何在這個基礎下往前走。

歷史

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（Benedetto Croce）曾經說：「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。」陳正熙老師說，（例如劇場）對過去的史料改寫，其實是將過去與現在連結，去回應當代的需求。他舉了從戒嚴到解嚴的臺灣，戰後臺灣有兩種史觀為例。一種是老師那一輩或前一輩受黨國教育而形塑的「灌輸統歷史觀」，另一種是當代民主化進程後，我們所謂年輕人擁有的「天然獨歷史觀」。這些史觀都是發展的歷程，歷史觀既然是被形塑出來的，代表它一直都有改變的可能。

陳正熙老師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，今年七月，在美國維吉尼亞州，過去支持奴隸制度、南軍的統帥李將軍（Robert E. Lee）雕像被拆除；作為對比，陳正熙老師貼了一張建國中學的蔣公銅像，這尊銅像過去以來，學生每年持續為銅像扮裝，銅像沒有拆除。陳正熙老師提出了一個對歷史有趣的思考：破壞或拆除銅像的行動，是矯正歷史錯誤，還是否定歷史真實？而否定歷史真實，是不是否定了過往的生活方式？

威權體制可能不單純只是一個歷史事實，雖然現在台灣已經解嚴，但是過往的威權統治，也是一種集體的心理狀態。在那個心理狀態中，不只有某方對過去懷念、覺得美好的情感，對所有人來說，那些全部的過往，影響了我們對現實的認知、現在當下的心理狀態。

固然有「黨國體制的歷史書寫」，也有「本土政權的歷史書寫」，我們不是要站一種立場，而是如何脈絡化和批判性的理解，然後從過去的歷史去看，我們現在的需求是什麼，如何回頭檢視史料，或改寫過去的歷史。

記憶

劇場呈現了相同歷史時空中，不同的記憶。在我們觀看每段記憶的時候，陳正熙老師說，或許可以將這段問題放在心中「誰的記憶？如何記憶？為何記憶？」劇場都是從個人的生命出發，但我們可以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或技巧，讓個人的記憶可以帶出一個

公共的、集體的記憶？如何從私人的、個人的，成為公共的、集體的，對紀錄劇場來說是重要的。

當代的紀錄劇場有幾種常見主題：例如《戲中壁》、《明白歌》、《非常上訴》，講二二八與白色恐怖；《再見歌廳秀》、《台灣有個好萊塢》，講流行文化；《逆旅》、《江/雲·之間》、《人間條件》，講族群生命。

在這些紀錄劇場中，雖然都是由個人的生命記憶出發，但常常可以看見對於同一段歷史，因為從不同的角度看，有不同觀點的對記憶的詮釋。

例如講過往族群記憶的《暗戀桃花源》與它的姊妹作《江/雲·之間》，在《暗戀桃花源》中，飾演雲之凡的演員有一次看不慣導演一直無法進入狀況，江濱柳眼前看的是淡水河，但心裡想的是黃浦江。飾演雲之凡的演員就對他說：「可是在你工作的時候，你必須要把你的主觀忘掉，四十多年的事，你又回不去。」飾演雲之凡的演員在某個政治潛意識裡，認為族群過往的記憶是「必須要被忘掉的」。

但是，卻在《江/雲·之間》，飾演雲之凡的演員丁乃竺卻說著，「《江/雲·之間》說的故事就是我父母那一代的故事……向深愛我們的父母親，還有那即將被遺忘、被刪除的勇敢年代致敬。」《江/雲·之間》建立的是一個表坊（官方）版本的記憶，認為外省族群的歷史必須被重視。

從《暗戀桃花源》的記憶認為應該被忘掉，而感到某種可笑或嘲諷的情緒，到《江/雲·之間》對記憶被遺忘的同情，兩者是矛盾的，所以，我們在看這些不同記憶的時候，仍是回到「是誰的記憶、為何記憶」。

劇場

而當歷史與記憶到了劇場，劇場在介入歷史敘事，和記憶再現時，會有什麼養的可能與侷限？陳正熙老師以狂想劇場廖俊凱導演的《非常上訴》為例，跟大家分享他的觀察。

《非常上訴》訴說的是兩位白色恐怖受難者陳欽生、楊碧川的故事，它談論「我本無罪，何言除罪？」、想傳達不法之法如何能做為定罪的依據，並在劇場中，以觀眾作為陪審團的角色，進行一場虛擬的「非常上訴」。

如果我們把作品當作是提問，陳正熙想提的疑問是，政治受難者的現身說法在劇場中扮演的角色是什麼？導演的角色與敘事權力的拉扯是什麼？觀眾進來時沒有人是一張白紙，但通過「劇場」之後，在他們身上的影響如何看？透過劇場，這是再現還是重寫？是一種劇場寓言嗎？

陳正熙老師提出兩篇劇評作為這些問題的回應。鍾喬老師在〈找回身體與記憶對話的過程《非常上訴》〉中提到，「劇場本來就是提問的空間，現實答案永遠是提問與再提問發生的過程。」，陳正熙老師說，即使有一個結果出來，它都不是一個最終的答案，是另一個提問的開始。鍾喬老師也說，現在消費主義的時代，會讓「我」一直疏離於「我們」，在觀眾進入劇場時，「一旦『我們』成為虛構的存在，歷史將成為天方夜譚的想像或緬懷對象。」

觀眾或劇場工作者在劇場中，當我們在看陳欽生、楊碧川的故事的時候，還是回到「如何從個人的變成公共的」，唯有變成集體的、公共的，我們才可以知道這兩個人、我們、集體在劇場中的連結是什麼。但集體的產生，也不是為了要去對抗什麼，而是去達到劇場裡面的溝通。當劇場結束了，而現實一直在發生……。

張敦智在〈以權力反對權力《非常上訴》〉中提出了一些批判，他說，觀眾進入劇場前，是不是已經有他的定見？陳正熙老師說，不只是《非常上訴》，其他白色恐怖相關的劇場作品也面臨這樣的問題：我們當然知道那段歷史是值得我們同情憐憫的，但是，當終點提前到達，面對那段壓迫的過往，我們是不是只是不斷肯認這樣的作法？張敦智在劇評中寫道，劇場裡觀眾的投票，如果我們就是能夠知道那最終的結果，那劇場對觀眾沒有實質的影響？如果沒有呢？

不過至少，「只有讓事實一再曝光，才能最接近理想轉型正義的論點。」張敦智說。陳正熙老師說，那個接近是慢慢的、不斷靠近的。

歷史、記憶與劇場，創作者的面對

陳正熙老師對「歷史、記憶、劇場」幾個關鍵詞的主講後，他對廖俊凱導演提出了幾個提問：處理紀錄劇場時，創作者的艱難是什麼？旁觀者「我」而非「我們」的疏離，該怎麼樣去面對？和現在網路時代，帶來怎麼樣的挑戰？

廖俊凱導演說，他自己創作的艱難，就是在面對陳正熙老師上述提出不同劇評批評時的感受；或當他在《非常上訴》用法律的名詞作為劇名，的確它呈現了某種立場，但演出時會回饋出某些排斥和挑戰。

而劇場如何從個人走到集體和公共，他想起他 2011 年做《逆旅》的時候，剛好是中華民國建國 100 年，那年到處都在慶祝。當年有一個重要的演出《夢想家》，在劇中，好像外省族群沒有黑暗的部分，就好像剛剛陳正熙老師提的李將軍故事，好像黑暗的部分不能被存在？廖俊凱導演說他做《逆旅》的時候，起心動念只是覺得這是一個邊緣的記憶，但有趣的是，有人問他為什麼要做、他是山東人嗎？但他只是一個南部小孩。

在《非常上訴》中，廖俊凱導演安排讓觀眾投票，其實是把自己放在一個非常不安全的位置，但他自認沒有強加觀眾任何想法的框架或暴力。他說在模擬法庭流程的時候，其實沒有強迫觀眾做指令，請觀眾起立，有人是沒有起立的，要投票時也有人沒投票。在劇場結束後，他不是那麼確定，觀眾有沒有被他改變，是有一些學校公民老師的回饋，但他覺得自己不是強加他的立場在劇場裡的。

而關於網路社群，廖俊凱導演印象 2000 年網路興起時，大家對網路社群的力量是一片看好的，好像有一種，每個人都能在網路發聲、人人成為公民記者的可能性。可是走到現在，我們才知道網路可能是怪獸，它遍佈了真假訊息，這是一個很諷刺，但也很有趣的事情。

如果年輕世代對過去的歷史疏遠，怎麼辦？

論壇尾聲，有一個很有趣的提問，有觀眾問，時代下壓迫的歷史，對年輕觀眾來說非常遙遠，想問陳正熙老師、廖俊凱導演對年輕觀眾或創作者有什麼期待？或希望我們可以獲得什麼樣的啟示？

陳正熙老師回應道，他覺得一方面，他們所謂曾經歷過那個時代的這些老人家們，沒有比較好的立場去說三道四，在講這個主題時代表的是他們的立場，但不是因為曾經歷過那段時間，所以他們的立場就有比較多的重量，或比較高的道德位置。即使經歷過那個時代，陳正熙老師說他們也都是順民。他們在那個時代中也沒有覺得這個不好，因為在那個時代中，沒有一個參照的點，去看，或質疑、提出疑問，所以就自然而然，去接受了這個社會對他們的期待和想像。

「我發現很多，老人家可能會倚老賣老，我自己也一直提醒自己不要這樣。」

另一個方面就是，陳正熙老師一直覺得現在在做白色恐怖的創作者，包含近幾年來，大家對太陽花學運跟香港反送中的連結，這樣某一種聯盟或網絡，「是現在你們這個時代的創作者最厲害的部分。也就是說你們利用網路時代的特性，為你們所用，連結起來成為一種集體的力量。」

陳正熙老師說，年輕觀眾或創作者，對前面說的那個時代史料的理解，絕對是不缺的。這個時代的創作者們，也應該能比較自由的去理解和運用這些史料，因為也許就因為沒有經過那個時代，所以沒有包袱。

「我必須承認在我們這個年紀的人，再怎樣自我反省、批判、想抗拒從小到大所接受的教養，我不可避免的老實說，我還是在持續抗拒我的包袱當中。就好像我對學生的態度也是這樣的，我身為老師總是會覺得，你們為什麼不好好的讀書、用功，為什麼不要怎麼樣、我們以前都怎麼樣，這種事情，其實是我自己的包袱，都時時要有自覺才能去抗拒。」

陳正熙老師回應這個朋友說的，「不用特別擔心你們跟過去的遙遠，那個遙遠反而可以給你們更大的一個空間或餘裕，讓你可以更沒有偏見的去接近這些史料，就好像你們跟這些政治受難者工作時，我們這個時代的人，我們可能會比較容易直接接受他的說法，但可能比較難有自覺地去對他的說法有批判，或挑戰他、質疑他，因為我們有那樣一個包袱。但是你們時間拉遠了，你還是可以同情、寬容和理解，不過因為距離的關係，那個寬容不會單純的包容，甚至不會是縱容，可能會是更有批判性的對話。」

「所以不要擔心，我相信你們會比我們更有機會，可以去好好的，更有批判性的面對臺灣過去的歷史。」